

# “重叠共识”视域下多元民族关系的正向生长<sup>\*</sup>

万明钢 杨富强

内容提要：民族多元、文化多样是当前多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族际界限不是变得模糊了，而是越来越清晰，民族多元在给世界呈现多样化的同时，也可能给人类发展制造障碍。文章以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理念为视角，对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走向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重叠共识 民族关系 正向生长 族际冲突 非政治价值原则

中图分类号：C9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2014）06—0055—06

作者简介：万明钢，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兰州 730070）；杨富强，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生（甘肃兰州 730070）、新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新疆乌鲁木齐 830011）。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虽然民族关系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体”趋势，但民族的多元现状将长期存在，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费孝通先生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别人可能会因为其单方面的历史的论证而强调民族融合为一体的单一历史过程之时，他却在清楚地提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即在“一体”的“大园圃”中，实际存在一种相互区分且有差异的“百花争艳”的“多元”局面。<sup>①</sup>各民族在展现精彩纷呈的“多元”过程中，族际间呈现的博弈也日趋显著。因此，在一个民族多元的国家，各民族如何相互和谐共存，是一个重大的课题。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理论，为我们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 一、族际冲突是“重叠共识”思想的社会背景之一

“重叠共识”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尽管公民从政治的视角对正义的理解有许多差异，但这些不同的政治观念有可能导致相似的政治判断；当这种相互重叠的政治判断具有很大相似性，甚至是同一个结论时，在不同群体之间通过判断所达成的共识就是“重叠共识”。其遵循的逻辑是“不同的前提有可能导致同一个结论”<sup>②</sup>。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并未就这一概念展开讨论，在1992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里“重叠共识”的理念得以充分阐述。他将多元的现实社会解释为一种“理性多元论事实”，它包含多种多样的道德、宗教、哲学学说，而且这种多元是现代民主社会所拥有的一个永久特征。换句话说，非民主、非现代社会，多元可能会暂时消失，但在现代民主社会“多元”是永恒的。他认为这是在自由制度框架内人类理性实践作出的正常选择。

罗尔斯经历了20世纪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历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毫无疑问民族主义所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多民族地区的民族认同与民族关系研究”（13BMZ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sup>①</sup>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全集》第13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7页。

<sup>②</sup>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15页。

呈现的多元冲突应该是其理论的现实来源之一。正如以赛亚·柏林对民族主义的形象描述：有一个控制了19世纪欧洲的思想和社会运动……它是当今世界现有各种思想、社会运动中最强大的运动之一，在有的地方则是唯一强大的运动；而那些没有预见到这一运动的人则为此付出了代价，失去了他们的自由，事实上是丧失了自己的生命。这个运动就是民族主义。<sup>①</sup>

罗尔斯主要的学术活动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是生活在民族主义浪潮背景下的一位思想家，民族主义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发挥的积极推动力和给世界带来的冲突与灾难都是他思考的对象。罗尔斯出生后，按照《凡尔赛条约》，1600万人获得了独立。他思考世界的时候，雅尔塔体系建立，更多的民族国家相继建立。一切似乎表明，民族主义推动了世界的脚步。但到20世纪80~90年代，民族主义以地方分离主义运动为主，民族问题和民族主义甚至表现为中东、西亚和南部非洲的民族战争，世界范围内汹涌不止的难民浪潮，再度复苏的种族歧视和种族排外，等等。<sup>②</sup>这种运动连西北欧一些以和谐稳定著称的国家也不放过，如法国的科西嘉、西班牙的巴斯克运动、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比利时的瓦隆族与佛兰芒族的语言之争、加拿大的魁北克，等等，在发达国家出现的一些分离运动中，政府依然能够控制局势，因此，还未出现较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就没有那么乐观：惨绝人寰的屠杀、充满血腥的自决，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sup>③</sup>回到非洲人手中的非洲并未因此安定下来，族际冲突以多个维度呈现出来，即使是曾被誉非洲民族一体化典范的坦桑尼亚，也面临着以斯瓦希里族为主体的桑给巴尔岛分离主义倾向的威胁。<sup>④</sup>在我国，国人在对民族主义浪潮给世界所带来的变化喝彩的同时，慢慢意识到，民族主义这头“怪兽”也开始侵蚀国内的民族关系，在新疆和西藏，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自20世纪80年代起，西藏和新疆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使得关注民族问题的学者开始为所谓的“疆独”“藏独”忧心忡忡，研究新疆问题、西藏问题成为显学。

即便罗尔斯以政治自由为思考目标，对这样一个民族多元纷争的社会大背景，他不可能视而不见。我们有理由说，族际关系应该是罗尔斯思考“重叠共识”的现实背景。

## 二、我国民族多元化的现实和发展趋势

关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先生从历史的维度和现实的广度予以了详尽的阐发，“民族多元”可能会在历史长河中持续很长时间，而且可能会由于人为干预而出现反弹。之所以如此，更多地与人类潜意识中存在着一种多样化的渴望有关，正如万明钢先生所言：从人类对多样性的追求、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思考角度来看……文化的多样性会让人类重新思考自身定位以及对人类发展的种种可能性，在面对几乎无法逃脱的市场与工具理性的宰制命运中，激起人类对自身反省与文化重建的希望。<sup>⑤</sup>

1. 民族多元的历史性。在发现仰韶文化之前，大家都认为所谓中国人的文化就像传说中的

① 以赛亚·柏林：《民族主义：出人意料的力量》，转引自徐迅：《民族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② 张建华：《民族主义的三次浪潮》，《学习时报》2014年4月26日。

③ 邢祝国、田凤娟：《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中文化对民族问题的影响力》，《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编著：《全球民族问题大聚焦》，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⑤ 万明钢：《论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与面临的困境》，《西北师大学报》2007年第1期。

老子，生下来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sup>①</sup>这实际上在各民族童年时期都有类似的说法，人类是源于一个人或者一对夫妇或兄妹，这实际上是简单的一元论表现，只有考古学出现以后，人类起源才开始了科学的讨论。中国考古学起步比较晚，发现仰韶遗址之后，中国文化西来说被学界所认可。随着中国大量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大量的文化遗存集聚在中原，因此，许多人也持有一元论的观点。费孝通先生指出，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过去长期存在着多元论和一元论、本土说和外来说的争论，直到上世纪5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我们才有条件对中华民族的早期作出比较科学的认识。<sup>②</sup>苏秉琦和殷玮璋先生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考古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sup>③</sup>近几年的考古发现陆续对此予以佐证，新疆、西藏、内蒙等地发现的石器和古人类遗址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肯定不是一个点。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国大地，中华文化究其起源而言并非来自今日中国域外任何一方，也不是从黄河中下游单源扩散至四方，而是呈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又相互渗透的。<sup>④</sup>

2. 地域的多样化是造就民族多元的物质基础。拉采尔 (F Ra-tzel)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集大成者，其随后的一些研究对自然环境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造成影响的理论给予了佐证。我国地形复杂多样，平原、高原、山地、丘陵、盆地五种地形兼备，这种地形地貌对人类交流造成了一定障碍，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很难想象在这种原始时代，分布在四面八方的人是出于同一来源，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长期分居在各地的人群必须各自发展其文化以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sup>⑤</sup>同时，在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这种多元化的地形地貌促进了多元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各种不同的文化特征的出现。随着农牧业的分离，经营农业和依靠牧业的民族各自发展了相适应的经济、文化体系。林耀华在其主编的《民族学通论》一书中，从经济文化类型学的角度，对整个中国文化做了详细划分，在这里环境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重要作用。

3. 民族如何为一体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列宁说过，民族差别“就是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以后，也还要保留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sup>⑥</sup>。1958年，毛泽东曾在成都会议上说：“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学界大都喜欢讨论民族融合的话题，讨论同化和融合的关系。同化的内涵既包含暴力、不平等、民族压迫的一面，也包含民族界限的被破坏、民族差别的被消除、各民族同化的趋势，没有必要把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区分得那么清楚。如果一定要强调民族同化词义中的强制因素与民族融合中的自然因素，那两者之间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sup>⑦</sup>由此可见，民族消亡的过程是相当漫长的，却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很多国家如非洲各国、亚洲各国，原本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全球化会不会把这些人最终都变成“美国人”？实际上不可能。但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很难变，佛教徒成不了基督徒，穆斯林成不了基督徒，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sup>⑧</sup>李晓霞先生曾对新疆阿图什市民族关系开展调查，结论是：各民族间的关系是较好的，在公共生活

① 陈星灿：《从一元到多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心路历程》，《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

②④⑤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73、4页。

③ 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2期。

⑥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6页。

⑦ 刘戈：《关于民族同化、民族融合问题的几点思考》，《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

⑧ 马戎：《全球化与民族关系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

领域内交往频繁,私人领域交往有限,民族界限清晰而又具有一定的层次性,不论从文化交融还是结构交融来说,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但多是表面的或个别的。<sup>①</sup>不论热衷于“一体”的我们对这些结论多么讨厌,如果我们单单注意了从多元到一体的传统国家的历史成长过程,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当下的社会处境,我们就会像盲人摸象一般找错地方,因为在经历了现代社会的大转变之后,社会构成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带有根本性意义的转变。<sup>②</sup>

虽然我们强调一体性,但从历史和现实看,民族是人类存在的一种必然形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国家只能释放善意,与民族结伴同行。<sup>③</sup>对多样性的追求、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思考、对族群文化的重建,凡此种种,在民族层面上,与各民族所坚持的“完备学说”有莫大的关系。

### 三、各民族已有的“完备学说”

合乎理性的“完备学说”是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按照他的说法,这一学说是“一种理论的实践”,是一种“实践理性的实践”,同时也是一种来源于某种学说或思想,并有所变化的。罗尔斯认为不同群体承认的“完备性学说”往往会偏重某些价值而忽略其他价值。<sup>④</sup>民族多元是不可避免的,民族之所以能够存在与各民族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民族传统等多方面的“完备学说”支撑有莫大的关系,在这种状态下,确保民族关系对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有促进作用而不是阻碍,罗尔斯的“重叠共识”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民族优越论是“完备学说”的翻版。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民族间的界限并没有因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变模糊,而是更为清晰,许多人幻想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在历史某个阶段,民族将会消失,事实上,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各民族均有适合自身发展的架构,民族意识<sup>⑤</sup>反而增强了,民族之间的界限更加明显了。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普遍经历了民族意识增强的过程,“民族识别客观上使族群成员的族群认同具有了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以户籍登记中的‘民族成分’而体现,它有意无意地提醒人们自己所具有的‘民族成分’与族群差别,而与‘民族成分’相关的政府制定的优惠政策会在客观上固化人们的族群认同”<sup>⑥</sup>。民族意识一旦增强,任何一个民族都会认为自己的民族文化是最优秀的,即便是否认自己的历史也不再乎,总觉得自己的民族架构最完备,而支撑这种明显差异的基础就是各民族已有的“完备学说”。

在我国,汉民族“完备学说”的典型就是大汉族主义产生的基础,大汉族主义歧视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陈天华称:“汉种是一个大姓,黄帝是一个大始祖,凡不同汉种,不是黄帝的子孙的,统统都是外姓,断不可帮他的;若帮了他,是不要祖宗了。你不要祖宗的人,就是畜生。”<sup>⑦</sup>

① 李晓霞:《新疆阿图什市民族交往调查》,《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② 赵旭东:《一体多元的族群关系论要》,《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③ 袁娥:《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11年第5期。

④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34页。

⑤ 熊锡元对民族意识解释为:“第一,它是人民对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第二,在与不同民族交往的关系中,人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认识的关切和维护。”这里的第二方面是第一方面的自然延伸,同时也说明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民族意识并不是抽象的,它来自生活实践同时也表现在其行为之中,个体的民族意识和感情汇集成群体的情绪,而群体的情绪又会反过来影响个体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从个人的感受来分析民族意识的产生及其变化、从心理学和个体与群体心态及其互动的角度来研究民族意识与行为,更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⑥ 明跃玲:《也论族群认同的现代含义——瓦乡人的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的变迁兼与罗树杰同志商榷》,《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⑦ 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

其中虽有历史原因，但大汉族主义的表现极为露骨。列宁曾强调指出：“在我们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当中，稍微有一点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就应当极其严格地加以追究，因为这种表现根本违背共产主义原则，会带来很大的害处。”<sup>①</sup>毛泽东提出：“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sup>②</sup>如果“黄帝构建”仅仅是试图追溯汉人群体的祖先，使大家通过对以往辉煌历史的重温来唤起民族自尊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事情就比较简单，也具有正面意义；但是如果这一构建是要排斥汉人以外的其他国内族群，采取把多族群的传统帝国撕裂为许多碎片，时时宣讲“汉民族”“蒙古民族”“满清民族”“西藏民族”这些概念，并把这些概念灌输到中国各族精英头脑里是西方帝国主义者所企望的。<sup>③</sup>由于汉族人口比重较大，在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中，我们往往强调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之所以出现就是这种主义背后的所谓“完备学说”在作祟。

2. 各少数民族“完备学说”往往是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毛泽东曾指出：“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sup>④</sup>地方民族主义亦称“狭隘民族主义”，这是一种以孤立、排外、保守为特征的思想。它往往只看到本民族暂时的、局部的利益，惧怕先进事物，甚至维护本民族中某些与社会主流价值相背离的东西，忽视其他民族的感受。在这里人们很容易把少数民族的民族感情、民族习俗、民族文化与地方民族主义思想混为一谈。实际上，民族主义的作用机制是利用民众的情感力量，因此它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我国某些少数民族中有极少数人并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有些人企图使本民族从中国独立出去，即使付出再高代价也在所不惜；有些人甚至宁愿把自己同国外的一些民族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就是想利用民族主义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民族主义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是明显的事实。<sup>⑤</sup>打着民族主义大旗的那部分人大都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以自己民族文化高于一切的认识为外衣，鼓吹地方民族主义，实际上对地区的安宁造成了很大冲击，对本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障碍。

#### 四、多民族“重叠共识”实现的路径

罗尔斯对于“重叠共识”从三个方面引导我们去理解：“不同的人们在承认观点上存在分歧的同时，在态度上却具有共识，即持不同观点的人们都愿意以合理的态度彼此相待。”“人们在承认价值方面发生分歧的同时，在规范方面却具有共识——不同价值的人们认可和遵守同样的规范。”“人们在承认现在的观念存在着分歧的同时，在未来的目标上却具有共识；或者说目前持有不同观点和立场的人们，努力寻求通过和平共处、平等交往而形成或加深彼此理解，甚至追求‘视域融合’。”<sup>⑥</sup>实际上就是在个体或者群体的“完备学说”之上形成交集，建构出一个各方面都可以接纳的共同区域，前提是不同的个体或者群体在态度上先行具有共识，有共同认可或者遵守的规范，在未来的目标上才可能具有一致性。要形成“重叠共识”需要遵守三个原则：其一，赞同宪政原则；其二，理性至上原则；其三，遵守非政治价值原则。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理念为多民族国家处理族际关系提供了一种思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种理念有其适用的可能性。

① 《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列宁选集》第4卷，第146~152页。

② 《批判大汉族主义》，《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75~76页。

③ 马戎：《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与“黄帝崇拜”的族群狭隘性》，《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6页。

⑤ 马立诚：《为何不要民族主义》，《环球时报》1999年11月19日。

⑥ 童世骏：《关于“重叠共识”的“重叠共识”》，《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按照“重叠共识”的第一个原则，确保各族体获取自由必须遵守当前的宪政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不论处于什么原因和目标，基于共同的政治理念，各民族均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前提下，让各民族获得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共同纲领》将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予以了规定；在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又做了明确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中要求各民族都有一定的代表参与国事，“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各民族国家”。在我国目前的宪政体制下，各民族享有的基本自由权已经得以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1984年出台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更是从各个方面诠释了各民族在当前政治体制下所享有的基本的自由权利，这是可以形成“重叠共识”的法律依据。

按照罗尔斯“重叠共识”的第二个原则，要建立在“类似于康德或密尔道德基础”之上，不同民族对民族自身利益的重视程度很可能会在丧失道德原则的前提下扩大本民族的利益，最典型的就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两种主义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宪法》（2004年）中明确规定，“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民族区域自治法》在总章中明确反对这两种倾向，“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大汉族主义思想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往往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居住交接地区民族遭受灾难的主要原因。乌鲁木齐“7·5”事件和昆明“3·01”事件就是民族主义话语与“康德或密尔道德基础”相背离的典型。

第三遵守非政治价值原则，“重叠共识”还包括一长串非政治的价值。“因为这类次要部分的价值有其自身的解释，它们的解释均基于从其内部引申出来的各种理念，使所有价值在各种特殊情况下都能达到相互平衡，无论是在群体中，还是在单个人身上。”<sup>①</sup>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不同民族与不同地区特定的经济、社会、地理、人文环境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不同民族文化带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按照第三原则的理解，我们认为，在政治之外的一系列价值之间相互具有平衡性。

在我国，虽然民族特征、所处的自然地理气候环境条件、历史发展和历史进程的不同而各有差异，但均符合“重叠共识”的三原则，因此，“重叠共识”理念适合于处理民族关系。按照目前情况，我国各民族虽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但各民族之间不存在整体对立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预设“重叠共识”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坚定的国家认同、平等的公民身份以及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责任编辑：刘欣

<sup>①</sup>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第73页。

### Thomas Piketty's Methodology and Theory on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iu Wen(7)

**Abstract:** Thomas Piketty's research on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mainly has made some analysis on the accum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Europe and America in the past 250 years. His conclusion is that social inequality will intensify when the income value by capital grows faster than the value of economic growth and human capital was defeated by financial capital and real estate capital. Inequality is not coincidental but an internal logic of capitalism. If the capitalism system is not changed, the meritocratic value which is capitalism faith will be under punch, and the capitalism democratic order and so—called "justice" will be threatened.

**Keywords:** Thomas Piketty; Das Kapital; Distributional inequality; Kuznets Curve; Patrimonial capitalism

### Sele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 Clusters of Xinjiang toward to Central Asia

Meng Yongsheng, Lu Ting(28)

**Abstract:** The five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has been Xinjiang'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since 1991. Promoting the cultivation of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 clusters toward Central Asia is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and realistic wa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re region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Petroleum chemical industry, Agro food processing industry, Textile industry,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New building materials industry are development priorities of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 cluster. Three core cities group, all levels development zones and frontier ports are priority development regions of export—oriented industry cluster.

**Keywords:** Central Asia;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 cluster; Selection and cultivation; Xinjiang

### Positive Growth of the Multi—ethnic Relation under " Overlapping Consensus"

Wan Minggang, Yang Fuqiang(55)

**Abstract:** The ethnic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s a common phenomenon existed in multi—ethnic country. Following with social development, the boundary of ethnic is not blurred, but clearer. The multi—ethnic phenomenon brings diversification to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and some obstacles to development of mankind. Based on " Overlapping Consensus" theory by Rawls, the paper made some discussion on the management of ethnic—relation in China.

**Keywords:** Overlapping consensus; Ethnic relation; Positive growth; Ethnic conflict; Principle of Non—political values

### Analysis on Reason of Regional Rel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and OSCE

Xiao Bin(69)

**Abstract:** The inter—regional relationship has developed very fast in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since their independence. The relation between OSCE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shows an excellent prospect in a series of inter—regional relations, except the relation lead by Russian. There are many presuppositions in academic world but fail to explain the reason of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OSCE and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thoroughly. The common knowledge of social science deems that only based on scientific theory and relatively stable variables, it is possible to give reasonable explanation to the reason. Therefore, based on Neo—class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alism theory, the author considered the reason of development of relation between OSCE and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is a result affected collectively by the three variables which are the in-